

古詩
君士集卷第一
善本鈎沉
日本藏宋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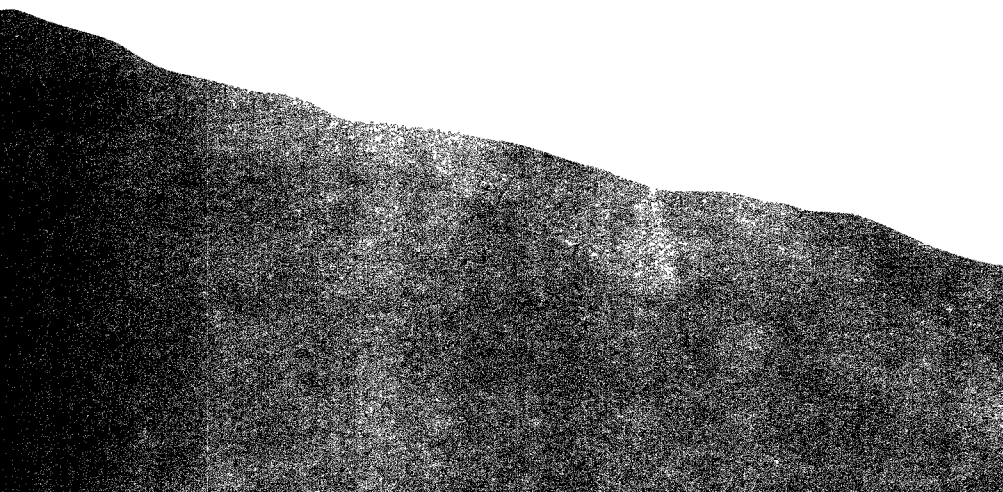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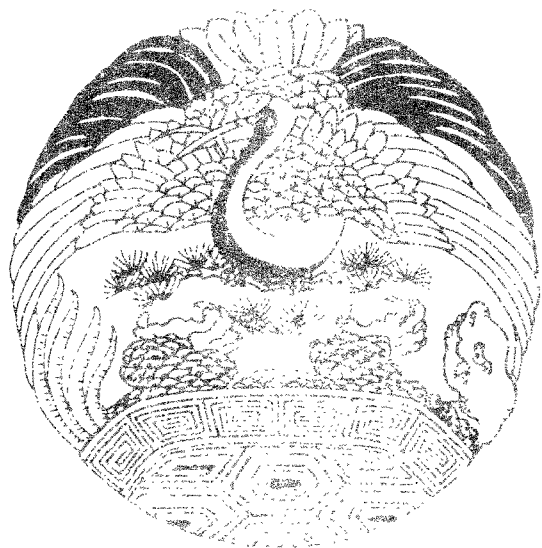
善本鈎沉

嚴紹盪
編撰



杭州大學出版社

日本文化研究叢書



嚴紹盪 編撰

日本藏宋人文集
善本鈎沉

杭州大學出版社

居士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顏跖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戾人肝九
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
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
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
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
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
輝一作輝光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並

日本國寶，天理圖書館藏宋孝宗年間《歐陽文忠文集》。
此本縱 28cm，橫 18.3cm，每半葉有界十行，行十六字，左右雙
邊。

杏山堂序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禁中瑞竹



和集



啼禽

汴堤鷺

與王正仲飲

記與王正仲會弟飲

書窻

紹巖上人寧親

送王殿丞

慈氏院假山

夜與鄰幾歸

夢游嵩山

雪中聞宋中道

和江鄰幾詠雪

送張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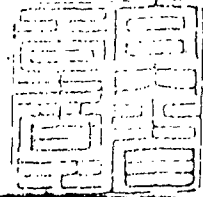
送周寺丞宰新鄭

和韓持國京師雪

送余郎中知鄭州

每集

内野氏藏本《宛陵先生文集》。此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



王文公文集卷第一

書

上 皇帝萬言書

上時政書

上五事書

上 皇帝萬言書

金澤文庫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
廷者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 陛下不自
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
下之事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
竊觀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

賜蘆文庫

宮內御物，宮內廳書陵部藏宋紹興年間《王文公文集》。
此本縱 22.5cm，橫 16cm，每半葉有界十行，行十七字，原中世
時代金澤文庫藏本。

誠齋集卷第九十五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解

天問天對解引

子讀柳文每病於天對之難讀杜少陵曰
讀書難字過然則前輩之讀書亦有病於
難字者耶病於難前輩與子同之初病於
難而終則易焉子豈前輩之敢望哉因取
離屈天問及二家舊注釋文而酌以子之
意以角之庶以易其難云

日本宮内御物，宮内廳書陵部藏宋端平年間《誠齋集》。
此本縱 22.5cm，橫 15.5cm，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左右雙邊。

中國的日本研究：一個簡短的回顧

——代叢書序

中國歷朝正史對日本的記載，不失為研究古代日本的珍貴史料；但《宋史》(14世紀)以前的官撰史書，均把“日本傳”歸入四夷之部，故盡管記奇風異俗、朝貢封賜頗詳，其本身還稱不上是對日本的研究。

明代，日本研究形成第一個高潮。《明史·日本傳》自不待言，書名冠以“日本”的著作亦競相問世。僅以嘉靖至萬歷約百年為例，研究日本的著作就可舉出《日本考略》、《日本圖纂》、《籌海圖編》、《日本考》、《日本一鑒》、《經略復國要編》等，現已佚散的估計數量也很可觀。明朝異乎尋常的日本研究熱，究其原因，與倭患觸發的海防關係密切，《日本考略·自序》云：“於茲猥屬為《考略》，以便御邊將士之忠於謀國者究覽。”可見這些著作類似於敵國便覽，偏重於概況羅列，而輕於研究探討。

迨至清季，在西方文化反復沖擊下，古老的漢字文化圈漸趨解體，尤其是日本率先維新成功，踏上“脫亞入歐”之路，迫使素以文明宗主國自居的中國，不得不刮目視之。在這種背景下，清代出現第二次研究日本的高潮。依賴文獻和傳聞研究日本的時代遂告結束，中國人終於走出國門，通過實地體驗，為后世留下豐富的訪日記錄，如《日本日記》、《使東述略》、《使東詩錄》、《日本紀游》、《談瀛錄》、《游歷日本圖經餘記》、《東游日記》、《扶桑游記》、《游歷日本考察商務日記》、《游歷日本考察農務日記》、《愚

齋東游日記》等等，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均是前代所無法相比的。然而，細讀這些訪日見聞，發現中國人所關注的，往往是日本西方化的層面，而非傳統的思想文化，故可謂之“曲綫的西方研究”。當然也有例外，如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堪稱明清日本研究的一座豐碑。

千餘年來，日本對中國的研究，已經達到巨細無遺的地步；反觀中國，自古以“華夷”色鏡視人，一旦到了非摘下不可時，恍然猶如隔世，弱鄰竟成強虜。甲午一戰，“泱泱大國”敗給“蕞爾小國”，從此中日反目成仇，更失去了客觀研究對方的基盤。黃遵憲在《日本國志自叙》中發過慨嘆：“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大夫好讀古書，足已自封，……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此種狀況至民國更甚，戴季陶有感於“中國”這個題目被日本人無數次解剖、化驗，而國人不願讀日本書、不願聽日本話、不願見日本人，更談不上什麼研究，於是發軔寫了部《日本論》，算是填補了空白。清末以降，國人負笈東游者劇增，他們通過日語翻譯了大量西學書籍，却很少有專門研究“和學”的。“五四”前後，周作人、錢稻孫等致力於介紹日本文學，因囿於文人士夫圈子，終未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

隨着戰后日本經濟的奇迹般騰飛以及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長期困擾日本研究的兩大障礙——“華夷思想”與“敵國意識”漸被清除，短短數年時間，大學的日語專業成倍增加，各種研究機構紛紛設立，研究日本的第三次熱潮，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席卷全國。尤其是近十年來，有關日本的翻譯、著作、論文以幾何級數猛增，這表明“日本”這個題目，終於被中國人放到手術臺上認真地解剖了。稍嫌不足的是，解剖的部位存在明顯的偏向，即語言文學、政治經濟等分野人才濟濟、碩果累累，而藝術、民俗、思想、宗教、社會等廣義的文化領域則門庭冷落，鮮有人涉足。

對日本文化研究的概念，很難作出精確的界定，或可比作對“日本”這個題目的綜合解剖。從局部研究過渡到綜合研究，是日本研究的又一次質的飛躍，其重要性漸為人們所認知，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自 1985 年始設日本社會文化碩士專業，杭州大學於 1988 年承辦日本文化史大學師資培訓班，均為日本文化研究的勃興蓄積了人才。鑒于國內迄今尚無一塊屬於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學術園地，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這套叢書，顯然正逢其時。但願這套叢書能為日本文化研究搖旗吶喊，為中日文化交流添磚加瓦。

本叢書聘請杭州大學校長沈善洪教授任中方顧問，日本思想史學會名譽會長石田一良博士為日方顧問，主編由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副教授擔任，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負責日常編務。

編 者

1990 年 10 月

目 錄

前 言	(1)
凡 例	(1)
宋人別集	(1)
宋人總集	(189)
宋人筆記	(209)
宋人詩文評	(269)
宋人詞曲	(277)
宋人編叢書	(295)

附 錄

日本文庫的漢籍特藏	(321)
本書著錄漢籍所藏日本文庫一覽	(345)
書名索引	(349)
後記	(374)

前 言

中國古代豐富的文獻典籍，是中華民族悠久而燦爛的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自有甲骨文字以來，中國的文獻典籍便綿亘數千年而不曾中斷。秦漢以來，先是由於人種的遷徙，以後更有了文化流通的多種渠道，使中國的古文獻典籍得以在東亞流傳。它一方面向東亞各民族傳達了中國的文化，一方面又為東亞各民族創造自己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有意義的材料，其時間之恒久，規模之宏大，構成了東亞文化史上壯麗的人文景觀。

從東亞各民族接受中國文獻典籍的歷史來考察，公元5世紀，中國籍移民王仁攜帶《論語》與《千字文》等，經由朝鮮半島的百濟國到達日本，並成為應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①由此而開始了中國文獻典籍向日本的傳播。日本在接受中國文獻典籍的時間方面雖然晚于朝鮮半島，但是，在20世紀之前的漫長的歷史年代里，兩國的使節、僧侶，以留學生為主干的知識人、商人，以及平民百姓，他們或則橫渡東海大洋，或則經由朝鮮半島，船運車載，手提背負，歷盡艱辛，築起了漢籍東傳的橋梁。9世紀末，日人藤原佐世以當時中央官廳藏書為對象，編撰了《本

^① 事實記錄見日本《古事記》卷中“應神天皇”，《日本書紀》卷十一“應神天皇”。事實考證參見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一章（江蘇古籍出版社刊），王家驊《古代日本的儒學》（載《中日文化關係史大系（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刊）。

朝見在書目錄》。其中著錄中國文獻典籍凡一千五百六十八種，為《隋書·經籍志》著錄的三分之二。^①至19世紀初，漢籍總量的百分之七十或八十已輸入日本。^②一千五百年來，日本在接受的規模方面，以及在文獻典籍的保存方面，在漢籍向域外傳播的歷史上，無疑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它構成了中國文獻學的一個特殊的係統，也創造了中日文化關係豐富而生動的場面。並且以這種文化關係為紐帶，造就了中日兩國睦鄰相處，和平友好的國際環境。

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初以來，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愈來愈囂張，“國權論”日甚一日。隨着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極端膨脹，中國文獻典籍不再作為文化交流的象徵，而是作為侵略勢力掠奪的對象，作為中國人民遭受帝國主義欺侮的象徵進入日本。據我本人近十年來在日本所作的考查，包括調查了日本的外交檔案，遠東軍事法庭的相關資料，原陸軍參謀本部文獻，並對有關的藏書處進行了實地的察訪，已知在從1930年至1945年8月止的十五年間，日本軍國主義者有計劃地從中國無償劫走文獻典籍共計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五種，另有二百零九箱（內裝不知具體數字），歷代字畫共計一萬五千一百六十六幅，另有十六箱（內裝不知具體數字），歷代碑帖共計九千三百七十七件，歷代地圖共計五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幅，歷代古文物共計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一件。這是中國文獻史上最為慘痛的

^① 參見嚴紹盪《日本手鈔室生寺本〈本朝見在書目錄〉考略》（《古籍整理與研究》總第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得泰船筆錄》卷三上記載，日本文政九年（1826）中國商船“得泰號”由駿河的下吉田上岸，船主朱柳橋與日人野田笛浦相互筆談。野田氏曰：“貴邦載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嘆。是以余可讀者讀之，不可讀者不敢讀，故不免下蟲之見者多多矣。”朱柳橋曰：“我邦典籍雖富，邇年以來至長崎者已十之七八。貴邦人以國字解之，不患不盡通也。”

時刻，它在中國國民，特別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上所留下的傷痕，無論是現在或將來，都將使我們銘刻於心。

中國學術界留意於文獻典籍的東傳，大約始於北宋時代。宋太平興國八年(983年)，日本僧人奝然抵中國，向宋太宗獻贈日本保存的中國佚亡書籍鄭玄的《孝經註》一卷及越王貞的《孝經新義》一卷。此事着實使朝廷震驚。所以，歐陽修便在《日本刀歌》中說：“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藥淹留卽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時書未焚，佚書百篇今尚存。”^①然而，在近代以前，中國學術界始終沒有把它作為“學術”來加以考察。到19世紀末，此種茫然的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

從文獻學的領域來說，黃遵憲與楊守敬是最早把“東傳漢籍”引入這一學術範疇的令人尊敬的學者。黃遵憲在他著名的《日本國志》中著錄了他當時在日本所見的漢籍；楊守敬更有意在日本查訪漢籍，匯成專著《日本訪書志》。由他們而開始了中國學者對傳入日本的漢籍的目錄學的、版本學的、校勘學等諸學科的研究。繼後有董康的《書舶庸譚》，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眼錄》，乃至孫楷第、王古魯專訪東京等地的漢籍小說等。中國學術界於是始知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尊經閣文庫等日本大宗漢籍藏書處，並震驚於日本收藏中國文獻典籍之巨富。

但是，前輩諸先生在著錄日本藏漢籍時，由於學術條件的限制，也還存在着不如人意的弱點。從文化史學的立場上考察，有些弱點是帶有根本性質的不足。第一，前輩諸先生還未能把中國文獻典籍在漫長的歷史時代中的東傳作為“文化現象”來加以考

^① 《日本刀歌》載《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五，然此篇也入《司馬文公集略》。關於此詩所說徐福行抵日本，乃為始於五代時的傳說。詳細考辯，參見嚴紹璽《中國文化在日本》第三章《徐福的傳說》(新華出版社刊)。

察和研究，因此也始終未能揭示以文獻典籍流布作為中間媒體而存在於中日文化之間的許多複雜的文化現象及其本質特徵。當然，更未能從東亞文化的相互關係中來闡明漢籍東傳的世界性的歷史意義。第二，前輩諸先生對日藏漢籍的著錄，只是隨手所得，經眼所錄，其中如楊守敬於日本訪書一百二十五種，傅增湘訪日藏漢籍一百七十二種，其餘各位皆在百種以下。始終未能對日本藏漢籍作一個總體的有計劃的調查、追蹤與評估。處在當時的條件之下，是不能苛求於他們的。但是，作為對一門學術史的回顧，也不能不指出這樣重大的學術疏漏。同時，我們還要指出的是，上述所有的從事於日本藏漢籍著錄的前輩，他們都是在本世紀 30 年代之前對日本進行的調查，距今已有半個世紀之遙。其間，中日兩國都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例如，他們都未能目睹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華民族文獻典籍空前的大掃蕩，更未能目睹戰後日本對漢籍的新的分割、保存與運用等。因此，對日本藏漢籍進行具有總體性意義的學術調查，並把它作為中日文化關係與政治關係的有機的組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明東亞文化的內在機制與中國文化的世界歷史性意義，已成為當代學術向中國學者提出的刻不容緩的重大課題。

我本人在先師魏建功教授等的教導下，長期留意於“日本的中國學”，對查明日本藏漢籍的諸種狀況，興趣尤甚。1985 年在擔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期間，有機會開始了我全面查考日本藏漢籍的設想。中國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把我的這一設想確定為全國重點項目，使我獲得了很大的支持。

但是要真正地開展這個工作，確是十分的困難。這是在異國進行的中國的學術項目，一是需要在日本有相當長的停留時期，一年兩年恐難以見效。二是需要熟悉日本近百個漢籍收藏機構，這其中有皇家的、公家的（中央的與地方的）、私人的（財團的與

個人的)、學校的(國立的、公立的與私立的)、宗教的(佛教各宗的與神道教各派的),此事極為繁難。三是需要有足夠的經費,在日本的許多藏書處閱讀藏書,包括國寶在內,確實都是“無料”(免費)的,但是,復印、制作膠片、收集相關的參考資料,往來於各地的交通與住宿費用等,所需不菲。憑我個人的條件與能力,要具備這樣三個基本條件,當然是十分的不容易。但是,我的這個工作,獲得了很多日本朋友的理解和支持。十年來,我有機會先後在日本的京都大學、佛教大學、宮城女子大學和文部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擔任客座教授,其中,京都大學和宮城女子大學對本項目都曾直接給予了經費的支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作為文部省的機構,還提供了購書的費用,佛教大學為我在寺廟中進行相關的調查創造了便利的條件。更有許多朋友包括許多前輩,如已故的貝冢茂樹、小川環樹,健在的島田虔次、羽田明、米山寅太郎、伊藤漱平、丸山升、清水茂、尾上兼英、高橋均、伊藤正文、大庭修、狹間直樹、吉田富夫、興膳宏、山田敬三、中島長文、田中隆昭、金子和正、冢本照和、村田裕子、丹羽香等各位,他們作為活躍在“日本中國學”第一綫的精英,在自身學術研究的百忙之中,對我的工作給予了鼎力的支持。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這一課題本身就體現了中日兩國的學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理解與合作,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的內容。

有關心我的朋友對我從事日本藏漢籍的調查與著錄,常常大惑不解。他們問我:“你那麼費勁地搞這些資料做什麼?”其實,朋友們的提問正是反映了當代學術中的一個致命的癥結,即從事所謂研究的人自己從來也不搞相關研究的原始資料的匯集、整理與考訂,常常東看西抄,瀏覽翻閱,偶發奇想,信口說來。更有那些為政治力與經濟力所趨動之徒,更無所謂研究需要有材料為證,論證需要有方法之規,奢糜浮誇之說極盛於一時。回顧學術文化研究的歷史,作為文學家的魯迅,一直在做着中國古文

獻的整理工作；作為史學家的郭沫若，一直做着古文字的考辨工作。他們始終把人文的研究，與確證的原始材料統一起來，對 20 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貢獻至大至巨。儘管有人處心積慮地想以所謂“簡單化”、“隨風倒”把他們也踩倒，從而樹立自己的新權威。但是，在今日的學術界我們難道真的有什麼人趕得上乃至超過於他們嗎？一個稱之為“學者”的文化人，如果一生中從未曾做過關於研究材料的發掘、整理與驗證的工作，那麼，他的所謂學術，其實是大可懷疑的。

大約十八年前，日本的西鄉信綱有《日本文學史》問世。西鄉氏在《文學史》中把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文化東傳日本，稱之為“殖民地文化”，把日本古代文學發展中的低潮時期，稱之為“學木乃伊的人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等等。當時，我還屬年青氣盛，便寫作一篇論文，題為《日本古代小說的產生與中國文學的關聯》，欲與西鄉氏論辯。論文在《國外文學》經層層審定，一一過關，正準備刊出之際，一位當時作為該刊顧問的日本文學研究的權威忽然表示不同意。後經編輯部斡旋，請該權威得以接見。權威說，你指名道姓西鄉信綱，日本以為又要發動對日大批判了。這使我若五雷轟頂，莫名驚詫。我自知力單，但作困獸猶斗狀。我就日本的神話，初期物語的形式與內容，引證了大約有五、六十種當時已傳入日本的漢籍為證，向權威一一陳述西鄉氏的荒謬。權威沉吟良久，對我說，你的材料很多呀，簡直太多了，叫人怎麼反駁呢？你這些材料是從哪里弄來的？最後，我們達成了君子協定——把論文中的日本先生的名字去掉，正面闡述自己的見解，由刊物發表。這就是見於 1982 年第二期《國外文學》上的那篇論文。五年後作為我國第一部論述古代中日文學關係的專著《中日古代文學關係史稿》，便是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當然，我一直後悔向權威作的這個妥協，內疚之心或許將隨我終身。但由此我也深深感到，人文研究只要有真實的材料為基礎，